

學力檢測與強制入班觀課之省思一 從教育政治學的微觀視角出發

余錦芬
嘉義大學博士班學生

一、前言

評量與教學是教育實踐的核心，兩者相輔相成。透過其有效結合，教師能精準掌握學生學習進展，並修正與設計更符合需求的教學策略，提升學習成效（Brookhart, 2011）。學力檢測是評量的重要形式之一，不僅衡量學生成果，亦在台灣教育政策中備受重視。然而，其推行過程中也暴露出利益博弈與意識形態的分歧。本文將以台灣學力檢測的發展為基礎，從教育政治學微觀角度剖析政策推動中的利益糾葛與權力運作，並探討其對教育公平與教學實踐的影響；最後，提出具體建議，為未來政策制定提供平衡性參考。

二、學力檢測在台灣的發展

學力檢測是台灣教育政策中的重要評量工具之一，旨在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提供教育決策時之重要參考；隨著政策推行，各縣市的實施方式與影響不同，突顯其在教育現場的挑戰與意涵，以下探討其發展歷程。

（一）苗栗縣率先實行學力檢測

2012 年，苗栗縣率先推行學力檢測，測試涵蓋國語、英語與數學，旨在全面診斷學生學習能力並為教育政策提供數據支持（胡蓬生，2024 年 5 月 29 日）。此舉不僅為地方政府與學校提供調整策略的依據，也成為其他縣市推行學力檢測的重要參考。

（二）過程中部分縣市取消學力檢測

儘管學力檢測在多數縣市取得進展，部分縣市因實施困難或成效存疑而取消或暫停。例如，桃園市認為檢測過於聚焦應試，未能全面反映學生多元能力（蔡依珍，2020）。此外，學力檢測亦徒增了師生的負擔，因涉及資源分配不均與方法適切性的疑義，所以也成為推行挑戰之一。

（三）台南市推動強行入班觀課與學力檢測

2023 年，台南市在推行學力檢測的基礎上，強制實施入班觀課，試圖透過學力檢測來評估與監督教學以提升教育品質（吳俊鋒，2023 年 9 月 23 日）。該作為之目的，是要縮小學行能力差距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，但也引發教師對自主權受限及執行壓力增加的擔憂。

（四）全台 16 個縣市統一推行學力檢測

到 2024 年，全台 16 個縣市已統一推行學力檢測，意即該政策的全國化與制度化（胡蓬生，2024 年 5 月 29 日）。統一測驗提高了數據可比較性，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，但隨檢測範圍擴大，其對教師、學生與家長的影響也日益顯著，如何平衡多方需求成為政策調整的關鍵課題。

三、教育政治學的微視觀點

學力檢測與相關政策推行中，涉及多方利益的競逐與權力的分配問題，反映出教育現場的微觀政治特質。本文參酌陳幸仁（2007，2008a）的研究，從教育政治學觀點中的利益、意識型態與權力三方面探討其複雜性。

（一）利益對立與調配

1. 組織利益

組織利益通常圍繞政策推行，其目的是提升學校表現與教育形象，並為地方政府爭取更多資源（陳正專，2010）。然而，這些政策在追求標準化的同時，可能忽視基層需求與實際情境的多元性。如 Walls（2020）所言，學校領導者若過度注重統一標準，可能會忽略教師與學生的需求，增加基層執行壓力。以台南市為例，學力檢測與強行入班觀課的政策雖旨在提升教育品質，但實際操作中，往往服務於地方政府績效需求，忽略了前線教師與學生的實際需求。

2. 自我利益

教師為維護教學自主權，常對過度干預的政策產生反感。Shaw（2024）指出，初任教師面對微觀政治壓力時，職業滿足感會下降，進而影響教學表現。強制入班觀課與學力檢測政策，雖旨在提升教育品質，但可能讓教師感到被監視，降低對工

作的認同與滿意度（許殷宏、武佳滢，2011）；這可能引發教師的抗拒情緒，並對教學氛圍與政策執行產生負面影響。

3. 專業利益

教師期望政策能尊重其專業判斷，避免因應試教育的壓力忽略學生多元發展需求（陳幸仁，2013）。Brosky（2011）指出，教師領導者需運用政治技巧，在專業需求與政策目標間取得平衡。然而，學力檢測的標準化要求雖有助於提供客觀評估，卻可能削弱教師的專業自主性，限制教學創意與彈性，影響教學品質。

4. 生涯利益

學力檢測結果若與教師的升遷或薪資掛鉤，將對教師職業壓力與生涯規劃產生直接影響（林志興、侯世昌，2015）。政策績效評估常與教師職業發展緊密相連（Masalon, Rodriguez, & Bantulo, 2022），這可能促使教師過度關注數據成果，忽視學生全面發展；這不僅可能導致教學失衡，還可能削弱教師對教育本質的堅守。

（二）意識型態的分歧

1. 科層體制 VS. 專業主義

科層體制注重標準化與效率，專業主義則強調個別需求與專業判斷（陳幸仁，2008a）。學力檢測與強制入班觀課政策過度強調標準化管理，可能侷限了教師的教學自主性，框架了其靈活調整的能力，從而影響教育品質。

2. 專業主義 VS. 家長主義

家長視學力檢測為提升學業成績的途徑，所以教師則更關注學生的多元發展（陳幸仁，2008b）。這種差異可能導致教師與家長間的溝通落差，增加教師壓力。學力檢測與強制入班觀課政策中的家長期待，可能成為無形壓力，削弱教師專業自主性並影響教學品質。

3. 專業主義 VS. 工會主義

工會主義的觀點著重保障教師權益，如薪資與工作條件，相對的專業主義則聚焦提升教育品質之改進（陳幸仁，2008c）。學力檢測與強制入班觀課政策可能加劇這種張力，因為過度強調教師權益可能限制改革的彈性，而追求教育品質提升則可能忽略教師需求。

（三）權力的分配與衝突

1. 政府與學校管理層的權力

當政策制定者過度集中權力時，如學力檢測或強制入班觀課，會壓縮基層教師的自主空間，影響其專業判斷與創新能力。教師若在這些政策執行中缺乏決策權，無法根據學生需求調整教學，將削弱其能動性，並可能導致教育政策實施困難，影響教育品質。陳幸仁（2007）指出，權力過度集中可能使教育體系僵化，抑制教師的專業發展與創造性表現。

2. 教師的權力與反抗

教師面對學力檢測或強制入班觀課等不合理政策時，通常會採取消極執行或集體訴求等方式表達不滿。盧柏全（2024）指出，教師的反抗不僅是對政策的抵制，也是捍衛教學品質與專業尊嚴的表現；儘管面臨壓力，這些反抗行為對教師調整與專業發展至關重要。

3. 家長與學生的權力

在當前的教育政策中，家長對學力檢測或強制入班觀課等政策具有較強的影響力，尤其在學校決策過程中，家長的需求和期待經常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。家長關注教育品質、課程設置和學生成績等方面，這使得學校在應對家長壓力時，會進行相應的調整。然而，學生的聲音卻常常被忽視，儘管他們是教育體系的核心。林志興與侯世昌（2015）指出，當家長的影響力過強，學校可能偏重家長的期望，忽略學生需求，導致教育政策偏離以學生為中心，影響教育公平與品質。

四、結論省思與建議

學力檢測與入班觀課政策的推行，突顯了教育現場中多元利益團體與權力結構間的複雜互動與張力。同時，此類政策的實施不僅為教育改革提供了契機，亦揭示了其內在挑戰與局限性。基於上述分析，本文將綜合相關論點進行總結，並以客觀理性的視角對相關政策進行深度反思與探討，進而提出具體建議，以期為政策改進與教育實踐提供參考依據。

（一）結論

1. 教育政策的雙刃劍特性

學力檢測與強制入班觀課政策揭示了教育現場的多層次挑戰，特別是在權力結構與利益衝突的背景下。這些政策雖有助於提升教育品質與數據透明度，但也對教師專業自主權、學生多元發展需求及教育公平性帶來壓力與挑戰。

2. 多方利益的角力

教師對過度干涉的政策感到反感，家長對應試成績的期待增加了政策推行壓力，而學生的需求與聲音卻常被忽略。這些問題突顯政策設計時，需平衡不同利益團體的需求。

3. 政策執行的實際困難

統一化學力檢測的實施雖能提供比較性數據，但忽略了地方特色與基層需求，導致現場教師在執行時面臨額外的壓力與挑戰。

（二）建議

1. 建立跨層級溝通機制

在政策制定初期，應成立跨層級的溝通小組，包含政策制定者、地方政府教育主管、學校行政、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，確保政策不偏重某一方利益。

2. 將政策重點由監督轉為支持

政策應重點放在提供更多實質幫助，讓教師能更有效應對教育現場的挑戰。同時，應擴充進修支持，提供足夠的經費補助與進修假期，讓教師能在不影響教學的情況下持續提升專業能力。此外，政策應具備彈性，允許教師根據學生的特性與需求調整教學方法，推動個性化與差異化教學模式。最後，透過定期舉辦專業培訓，如教學科技應用及學生心理支持策略，幫助教師掌握最新的教學趨勢與技能，進一步提升教育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。

3. 應試教育與多元發展的平衡

學力檢測應加入跨領域素養題與情境應用題，測試學生的批判思維與問題解

決能力，減少僅針對記憶與計算的評估。同時，每年應檢討檢測設計，確保其符合全人教育的目標。此外，應推動校本課程，如藝術、體育與社會參與活動，補充應試學科的不足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，並設立創新課程基金，支持學校依學生需求設計跨領域課程。

4. 促進親師對話

定期舉辦家校座談會，邀請教師向家長說明學力檢測及政策背景，增進家長對教育目標的理解，強調教育不僅關注學業成績，更重視學生的全面成長，促進彼此合作共識。

參考文獻

- 吳俊鋒（2023 年 9 月 23 日）。要求取消學力檢測、強制入班觀課南市教師會、教育局交鋒。自由時報。
<https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breakingnews/4437442>
- 林志興、侯世昌（2015）。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互動的微觀政治素養研究。嘉大教育研究學刊，35，63-104。
- 胡蓬生（2024 年 5 月 29 日）。國中小基本學力「大會考」全台 16 縣市明天同步登場。聯合報。
<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325/7995547>
- 陳正專（2010）。分佈式領導的微觀政治學。彰化師大教育學報，18，1-27。
- 陳幸仁（2007）。微觀政治學：一個學校行政的新興研究領域。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，3，67-86。
- 陳幸仁（2008a）。學校組織行為之微觀政治探究。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，17，1-25。
- 陳幸仁（2008b）。家長參與校務決策之微觀政治分析。國民教育研究學報，21，91-114。
- 陳幸仁（2008c）。學校教師會運作之微觀政治分析：一所小學之個案研究。屏東教育大學學報(教育類)，30，23-54。

- 陳幸仁（2013）。微觀政治及其在學校領導之應用。《教育學報》，41(1-2)，1-25。
- 蔡依珍（2020 年 12 月 30 日）。減輕學童壓力 桃園取消國小學力統一檢測。中時。
<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realtimenews/20201230005595-260405?chdtv>
- 盧柏全（2024）。校長推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之微觀政治素養分析。《學校行政》，154，88-110。
- Brookhart, S. M. (2011). Educational assessm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teachers. *Educational Measurement: Issues and Practice*, 30(1), 3-12.
- Brosky, D. (2011). Micropolitics in the school: Teacher leaders' use of political skill and influence tactics. *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reparation*, 6(1), 1-11.
- Masalon, R. H., Rodriguez, G. D., & Bantulo, J. S. (2022). School heads' micro politics abilities, shared leadership, capacity building skills and school performance. *Global Scientific Journals*, 10(4), 1722-1737.
- Shaw, R. D. (2024). A beginning music teacher's micropolitical literacy development. *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*, 72(3), 247-266.
- Walls, J. (2020). (Don't) lean on me: The micropolitics of car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.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*, 26(4), 1-25.

